

百苗图各抄本所见印信研究

唐生周 鲁明新

【摘要】《百苗图》是研究贵州各世居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图志文献，目前传世抄本众多，最早的抄本可以上溯到清嘉道年间，最晚的抄本则迟至 20 世纪中期。若能按时间顺序，就其所书和所绘内容做系统对比，就不难发现贵州各世居民族历史文化演变的基本脉络。若要准确考定各抄本的传抄时间和地理位置，书中所见印信自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佐证价值。遗憾的是，传世的各抄本中，仅有一部分保留有印信。这些印信大多为篆文雕刻，加上复印件和出版版本印文不免模糊难辨，因而识读和考证工作难度很大。但通过认真识读和考订，大多数印信印文，基本可以考明持有者的人名和身份，所获信息可以为考订相关各抄本的传抄人、传抄时间、传抄地点提供有力的证据。

【关键词】百苗图；抄本；印信；传抄时间；持有人身份

【中图分类号】G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644(2016)04-0001-26

一、印信使用概说

传世的《百苗图》各抄本，源出于陈浩所撰《八十二种苗图并说》。该书成书于清嘉庆中期。书成后，转由贵州省政府保存，并做为施政参考之用。清人李宗昉亲眼见过此书，并将该书的文字部分收载于其所撰《龄记》一书之中，而原作附图由于受当时印刷技术所限，没有收入《龄记》。其后，来贵州任职的官员和文人学士都有幸见过《八十二种苗图并说》，并有人做过该书的临摹传抄工作，从而构成互有区别的抄本，这些抄本最后被统称为《百苗图》。至此，该书的附图才得以流传至民间，并流变为各式各样的抄本，同时书名也随之而异。这些传抄本抄于何时、由何人传抄，抄本本身所能提供的信息非常有限，因而要考订有关问题难度极大。

有幸的是，其中某些抄本在其所抄文字和附图中，保留有私人印信和收藏印信，有的还有收藏编号。这就为相关抄本的传抄时间、传抄人、传抄地点的考订，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从而相关抄本的史料价值也得以大幅度提升。为了方便进一步的考订，在此仅将各抄本保留有印信的实况表列如下：

表1 《百苗图》各抄本印信使用统计概况

版本名称	私人印信数量	收藏印信数量	无法识读印信数量
1 博甲本	16	1	1
2 台乙本	8	1	0
3 法兰西(IHEC)本	29	1	3
4 早大本	7	1	1
5 国会本	2	1	0
6 刘甲本		1	
7 民院本			
8 台甲本		1	
9 刘乙本			
10 博乙本			
11 师大本		1	
12 省图本		1	
13 刘丙本			

(注:1. 贵州博物馆收藏甲种本,简称“博甲本”;2. 台湾中央研究院新版《番苗画册》,简称“台乙本”;3. 法兰西图书馆收藏版本,简称“法兰西(IHEC)本”;4. 日本早稻田大学收藏《蛮苗图说》,简称“早大本”;5. 美国国会收藏本,简称“国会本”;6. 刘雍个人所藏甲种本,简称“刘甲本”;7. 贵州省都匀市黄氏家族藏本,简称“民院本”;8. 台湾中央研究院依据台湾傅斯年图书馆藏本影印公开发行的《蛮苗图册》,简称“台甲本”;9. 刘雍个人所藏“乙种本”,简称“刘乙本”;10. 贵州省博物馆藏乙种本,简称“博乙本”;11. 贵州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本《百苗图》,简称“师大本”;12. 贵州省图书馆藏本,简称“省图本”;13. 刘雍个人所藏丙种本,简称“刘丙本”)^[5]

从表中不难看出,保留有印信的抄本为数不到一半,但这些印信的价值依然不容低估。只需考明这些印信持有者的姓名和身份,那么各相关抄本的传抄时间和地点就可以通过类推而水落石出了。再以这样的抄本为标志,就可以大致推定出其他抄本的传抄人身份、传抄时间、传抄地点,接下去的研究工作也就方便多了。以下仅就已经识读的印文展开初步研究,以求正于海内贤达。

二、印信印文识读与释读

加有印信的抄本虽说数量不多,但只需对这些印信的印文加以识读和释读考订,就可以获得极其准确可靠的史料信息。各抄本中,“博甲本”“法兰西本”“台乙本”“国会本”“早大本”印信使用丰富,这些印信印文绝大多数为篆文雕刻,识读难度较大,但识读完成后,其资料价值也极为可观。其他各抄本大多只保留有收藏印信,但这些印信涉及到英文、法文、日文,还涉及到各收藏单位的收藏编号,准确释读也都能提供重要的历史资料,不过就总体而言可利用价值不大,本文仅作必要的交代。这里仅集中全力以传抄时间先后为序,对所见印信印文逐项考释如下。

(一) “博甲本”所见印信

经过仔细查找,传世的“博甲本”中,共计使用过印信 23 枚。这些印信所出现频率详见表 2。以下依次对这 23 枚印信中能够正确识读的 22 枚印章的印文逐一陈述。识读难度太大,不能准确识读者尚有 1 枚,留待下文展开讨论。(又为了与原字保持一致,以下行文中凡属首次转写的印文,均用繁体排印,解释文字则按简体排印。)

(1)



廷珏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阴刻，2字并列。这枚印信在“博甲本”中，共计出现28次。这是一枚私人的姓名印章。鉴于此印信出现频率很高，因而可以认定“博甲本”众多文字与绘图极可能都出自此人之手。

(2)



廷珏该组印信为方形，单字篆刻“廷”字篆文阴刻，“珏”字篆文阳刻。这组印信在“博甲本”中，共计出现11次。这组印章与上文“廷珏”印的持有人显然是同一人。

(3)



張廷珏印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阴刻，4字两行。这枚印信在“博甲本”中，共计出现1次。这枚印章的持有人与上述印章相同。同一持有人拥有多种多枚个人姓名的印章，足以佐证这位持有人是一位职业的书画篆刻家。只需查明此人的生平来历，“博甲本”的传抄时间、传抄人、传抄地点和传抄背景就都可以得到大致廓清了。具体考定结果请参见下文。

(4)



紹渠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阳刻，2字两行。这枚印章在“博甲本”中，共计出现30次。大多数情况是与张廷珏的私人印信连用。因而这枚印章印文可能意在表明张廷珏此人的出生籍贯。“紹渠”可能是灌溉渠的名称，或者是河流的名称。张廷珏可能就出生或生活在此地。此外也有人怀疑“紹渠”二字的印文可能是张廷珏的别号。在此聊备一说，仅供参考。

(5)



壽松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阳刻，2字并列。这枚印信在“博甲本”中，共计出现17次。该印信在“博甲本”中经常与“张启仕”印连用，可以获知印文内容可能是张启仕的表字或者别号，又或者是私人的艺名。使用这两个字为艺名，足以提示我们印文的持有人张启仕年纪可能稍大，而且很可能是张廷珏的本家长辈。

(6)



英偉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阴刻，2字并列。这枚印信在“博甲本”中，共计出现11次。

(7)



思議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阳刻，2字并列。这枚印信在“博甲本”中，共计出现11次。此印与上文“英伟”印连用。足证这两方印属于套印。这是一组艺术家的鉴赏用印。它属于张廷珏还是张启仕，则有待进一步考订。

(8)



將勤補拙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阴刻，4字双行。这枚印信在“博甲本”中，共计出现10

次。大多单独出现。其中一处与“廷”“S”组印同时出现，且“廷”“S”组印位于文末落款处“将勤补拙”印位于行文首行顶端。足证这枚印章是张廷珏的艺术鉴赏印。意在表达张廷珏本人勤勉从艺以弥补天资不足之意。因而这枚印章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张廷珏的身份地位不高，生活仰仗勤奋作画来维持。这更证明他有可能是一位职业书画家。

(9)



光霁该印信为椭圆形，篆文阳刻，2字上下连刻。这枚印信在“博甲本”中，共计出现2次。这枚印信2次都与“张廷珏”印、“绍渠”印共同出现在同一幅绘画中，且“张廷珏”印、“绍渠”印位于文末落款处“光霁”印位于行文首行顶端。这足以证明“光霁”印也是张廷珏的艺术鉴赏印。

(10)



知止不殆该印信为椭圆形，篆文阳刻，4字两行。这枚印信在“博甲本”中，共计出现2次。其中一处与“廷”“3”组印共同出现在同一幅绘画中，且“廷”“3”组印位于文末落款处“知止不殆”印位于行文首行顶端。据此可知“知止不殆”印也是张廷珏具有自勉意味的艺术鉴赏印。

(11)



樂此不疲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阳刻，4字两行。这枚印信在“博甲本”中，共计出现2次。一处是与“知止不殆”印共同出现在同一幅绘画中。“知止不殆”印位于文末落款处“乐此不疲”印位于绘画右下角处。再一处与下文“醉月”印共同出现在同一幅绘画中。“醉月”印位于文末落款处“乐此不疲”印位于绘画右下角处。按情理推测，这方印也应当是张廷珏的艺术鉴赏印，印文的性质相同。

(12)



琴書自薦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阳刻，4字两行。这枚印信在“博甲本”中，共计出现2次。一处是与“廷”“珏”组印共同出现在同一幅绘画中。“廷”“珏”组印位于文末落款处“琴书自荐”印位于行文首行顶端。再一处与“张廷珏”印、“绍渠”印共同出现在同一幅绘画中。“张廷珏”“绍渠”二印位于文末落款处“琴书自荐”印位于行文首行顶端。足证这枚印章也是张廷珏的艺术鉴赏印。使用这枚印信意在表达，希望借助自己的书画技艺能够引起世人关注受到重用之意，因而它也是张廷珏为职业书画家的有力佐证。

(13)



雲漢為章该印信为椭圆形，篆文阳刻，4字两行。这枚印信在“博甲本”中，共计出现1次。这枚印信与“张廷珏”印、“绍渠”印共同出现在同一幅绘画中。“张廷珏”“绍渠”二印

位于文末落款处“云汉为章”印位于行文首行顶端。足证这枚印章也是张廷珏的艺术鉴赏印。

(14)



松風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阳刻，2字并列。这枚印信在“博甲本”中，共计出现1次。单独位于文末落款处。鉴于“张启仕”印与“寿松”印连用。据此推测，这枚印信应该是张启仕的表字或别号的私人印信。

(15)



專間该印信为圆形，篆文阳刻，2字并列。这枚印信在“博甲本”中，共计出现10次。这枚印信有四处与待释第1号印共同出现在同一幅绘画中，二印均位于文末落款处。再有四处与“青松白云”印共同出现在同一幅绘画中，二印均位于文末落款处。再一处与“良有以也”印共同出现在同一幅绘画中，二印均位于文末落款处。最后一处与“象斋”印共同出现在同一幅绘画中，二印均位于文末落款处。据此推测，该印的印文应当是一位不知名艺术家的表字。

(16)



张启仕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阴刻，3字双行。这枚印信在“博甲本”中，共计出现17次。出现背景已见于上文。这显然是一方私人人名印信，因而这位张启仕和张廷珏一样可能是该画册的主要抄临人，他的社会身份也应当与张廷珏相同，是一位职业的书画家。

(17)



醉月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阳刻。2字上下排列。该印信在“博甲本”中，共计出现5次。出现背景见于上述。

(18)



青松白云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阳刻，4字两行。该印信在“博甲本”中，出现共计4次。出现背景见于上述。

(19)



象齋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阳刻，2字并列。这枚印信在“博甲本”中，共计出现2次，出现背景见于上述。

综上所述“博甲本”的所有绘图和文字书写最多出自3位书画家之手，其中仅张廷珏生平可以考定。有关内容详见下文。

(20)



良有以也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阳刻，4字两行。这枚印信在“博甲本”中，共计出现2

次。出现背景已见于上文。

(21)



桐城姚氏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阳刻，4字两行。这枚印信是“博甲本”的收藏印章，出现在“博甲本”的内封之中。根据出现的位置不难推测出，整个“博甲本”由该印的持有人出资招募张廷珏等人抄临成书，书成后又由出资者收藏保管并传之后世，最后辗转珍藏于贵州省博物馆。

表2 “博甲本”已识读印信使用概况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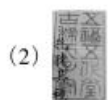
编码	印信内容	出现条目	次数	出现页码
1	廷珏	俾僮、卡尤仲家、补笼仲家、马蹬龙家、大头龙家、红苗、白苗、剪发佬佬、依苗、猪屎佬佬、锅圈佬佬、木佬、蛮人、楚人、瑶人、伴僮苗、阳洞罗汉苗、斧头苗、八寨黑苗、黑生苗、黑仲家、白儿子、白仲家、黑脚苗、黑楼苗、郎慈苗、六洞夷人	28	P. 2, P. 36, P. 40, P. 64, P. 70, P. 84, P. 92, P. 114, P. 142, P. 154, P. 184, P. 202, P. 216, P. 225, P. 238, P. 252, P. 290, P. 380, P. 396, P. 426, P. 446, P. 472, P. 488, P. 562, P. 570, P. 581, P. 592, P. 606
2	廷珏	罗鬼女官、曾竹龙家、花佬佬、紫盖苗、洞家苗、白龙家	6	P. 11, P. 54, P. 168, P. 272, P. 390, P. 480,
3	张廷珏印	臂苗	1	P. 306
4	绍渠	俾僮、卡尤仲家、补笼仲家、马蹬龙家、大头龙家、红苗、白苗、剪发佬佬、依苗、猪屎佬佬、锅圈佬佬、木佬、蛮人、楚人、瑶人、伴僮苗、阳洞罗汉苗、斧头苗、八寨黑苗、黑生苗、黑仲家、白儿子、白仲家、黑脚苗、黑楼苗、郎慈苗、六洞夷人	28	P. 2, P. 36, P. 40, P. 64, P. 70, P. 84, P. 92, P. 114, P. 142, P. 154, P. 184, P. 202, P. 216, P. 225, P. 238, P. 252, P. 290, P. 380, P. 396, P. 426, P. 446, P. 472, P. 488, P. 562, P. 570, P. 581, P. 592, P. 606
5	寿松	蔡家苗、狗耳龙家、花苗、水佬佬、佬佬、九股苗、谷洞苗、菁苗、九名九姓苗、里民子、鸭雀苗、葫芦苗、洪州苗、西溪苗、车寨苗、生苗	17	P. 24, P. 58, P. 78, P. 176, P. 210, P. 260, P. 282, P. 312, P. 370, P. 456, P. 464, P. 506, P. 516, P. 524, P. 532, P. 544, P. 552
6	英伟	青苗、黑苗、天苗、土人、披袍佬佬、杨保苗、八番苗、克孟牯羊苗、水家苗、白额子、黑山苗	10	P. 100, P. 108, P. 132, P. 192, P. 197, P. 244, P. 266, P. 298, P. 342, P. 360, P. 418
7	思议	青苗、黑苗、天苗、土人、披袍佬佬、杨保苗、八番苗、克孟牯羊苗、水家苗、白额子、黑山苗	10	P. 100, P. 108, P. 132, P. 192, P. 197, P. 244, P. 266, P. 298, P. 342, P. 360, P. 418
8	将勤补拙	俾僮、曾竹龙家、青苗、依苗、水佬佬、菁苗、八寨黑苗、黑仲家、白仲家、罗汉苗、六洞夷人	11	P. 3, P. 54, P. 100, P. 142, P. 177, P. 313, P. 396, P. 447, P. 489, P. 600, P. 606
9	光霁	猪屎佬佬、锅圈佬佬	2	P. 155, P. 185
10	知止不殆	花佬佬、洞家苗	2	P. 169, P. 332
11	乐此不疲	洞家苗、冉家蛮	2	P. 333, P. 367
12	琴书自娱	罗鬼女官、卡尤仲家	2	P. 11, P. 37
13	云汉为章	花苗	1	P. 78
14	松风	东苗	1	P. 118
15	尊同	白俾僮、青仲家、西苗、打牙佬佬、桐人、伶家苗白额子、楼居黑苗、高坡苗、土佬佬、罗汉苗	10	P. 16, P. 48, P. 126, P. 148, P. 232, P. 322, P. 360, P. 412, P. 434, P. 498, P. 601
16	张启仕	宋家苗、狗耳龙家、花苗、水佬佬、佬佬、九股苗、谷洞苗、菁苗、九名九姓苗、清江仲家、里民子、鸭雀苗、葫芦苗、洪州苗、西溪苗、车寨苗、生苗	17	P. 24, P. 58, P. 78, P. 176, P. 210, P. 260, P. 282, P. 312, P. 370, P. 456, P. 464, P. 506, P. 516, P. 524, P. 532, P. 544, P. 552
17	醉月	罗鬼女官、九股苗、冉家蛮、平伐苗、尖顶苗	5	P. 2, P. 261, P. 366, P. 442, P. 586
18	青松白云	白俾僮、西苗、白额子、土佬佬	4	P. 16, P. 126, P. 360, P. 498
19	象裔	桐人、洞苗	2	P. 232, P. 306
20	良有以也	红佬佬、伶家苗	2	P. 160, P. 322

（二）台乙本

“台乙本”仅在 1 幅绘图中就同时出现了 8 枚印章。此外，还有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的收藏印章，还有 1 枚收藏记录卡片。据台湾中央研究院称“该本”与“台甲本”原先都由傅斯年个人收藏，傅斯年去世后转由研究所收藏。这两本书的来历都是傅斯年在北京、南京收购而来。



乾隆御覽之寶该印信为椭圆形，篆文阳刻，6 字三行。这枚印信在“台乙本”中，共计出现 1 次。位于“讠佬”条附图上部。按照篆文字面涵义，应当理解为这是乾隆皇帝的私人印信。



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阳刻，10 字两行。这枚印信在“台乙本”中，共计出现 1 次。位于“讠佬”条文字右上角。按照篆文涵义，五代当指太祖、太宗、世祖、圣祖、世宗五代皇帝；而在清朝皇帝中能够称得上古稀之年者，只有乾隆皇帝一人。但到乾隆朝时，清朝已是第六代。印文的涵义与乾隆皇帝在位实情明显不符。故这枚印信显然是赝品。这就为“台乙本”作假提供了铁证。



古希天子该印信为圆形，篆文阳刻，4 字右左上下排列。这枚印信在“台乙本”中，共计出现 1 次。位于“讠佬”条文字中上部。乾隆晚年为太上皇之际年龄已超过 70 岁，因而自称“古希天子”应当是可信的。按情理这枚印信应当是他晚年的鉴赏印信。但是这枚印信在该画本中只出现 1 次，而且与上述各印同时出现在同一幅画中，这完全不符合用印的习惯。因而即便该印文无可挑剔，但用印的位置却暴露了作伪的马脚。



古稀天子之寶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阳刻，6 字三行。这枚印信在“台乙本”中，共计出现 1 次。位于年款所在位置。这枚印章按情理应当与上一枚印章相同，都是乾隆晚年的鉴赏印信。但用印位置同样也暴露了作伪的马脚。



犹曰孜孜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阴刻，4 字两行。这枚印信在“台乙本”中，共计出现 1 次，并与“古稀天子之寶”印出现在同一位置。按理这应当是一枚乾隆皇帝晚年用以自勉的鉴赏印信，但其作伪的痕迹已见于上述。



臣廷锡该组印信为方形，分上下两段刊刻，上端阳刻一“臣”字，下端阴刻“廷锡”二字

。结合该图文字部分的署名落款得知，这应当是清雍乾年间执掌贵州政务的大臣蒋廷锡的私人印件。



臣世寧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阳刻，3字两行。这枚印信在“台乙本”中，共计出现1次，与“恭绘”印并处相近的位置，且位于“谕佬”条绘画左下角署名“郎世宁”落款处。与“恭绘”印连用，可以推知，这枚印信应当是清朝宫廷画师郎世宁的私人印鉴。



恭繪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阳刻，2字并列。这枚印信在“台乙本”中，共计出现1次，并与“臣世宁”印出现在同一位置。因而按理也应当是郎世宁的专用印章。

这么多枚持有人地位显耀的印章，集中出现在整个画本的某一画页，特别是性质相同的印鉴出现在同一幅画页，本身就不符合鉴赏用印的规则，因而该画本的作伪痕迹昭然若揭。该画本为伪本，此前已有人做过深刻探讨，在此无需赘述。需要深入探讨之处仅在于皇帝的私人印信，蒋廷锡、郎世宁的私人印信，为何会落到作伪者手中。这个问题若不加澄清，其作伪的行径很难为今天的读者所信服。在笔者看来，这些印文可能都不是出自皇帝和大臣的印信，而是清末篆刻家的仿刻。仿刻的蓝本则来自故宫被北洋政府接管时流出的文物，在流出的文物中很容易找到这批印章的印文真迹，而这些真迹极有可能流入西泠印社的画师手中。其中的篆刻高手只要有真迹蓝本，仿刻这些印章完全不成问题。仿刻的目的都是为了谋取暴利。既然“台乙本”已经出现了这批印章印文，那么类似文物肯定还会出现。与这批印章印文相比较，或可鉴别文物的真伪，则这批印章印文或可成为鉴别文物真伪的有力手段之一。

表3 “台乙本”已识读印信使用概况

编号	印信内容	出现条目	次数	出现页码
1	乾隆御覽之宝	红谕佬	1	P. 162
2	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	红谕佬	1	P. 163
3	古稀天子	红谕佬	1	P. 162
4	古稀天子之宝	红谕佬	1	P. 163
5	犹曰孜孜	红谕佬	1	P. 163
6	臣、廷锡	红谕佬	1	P. 163
7	臣世宁	红谕佬	1	P. 162
8	恭绘	红谕佬	1	P. 162

(三) 法兰西 (IHECPANICS) 本

“法兰西”本共有31个条目并绘图，其中有28条目并绘图有印文出现，所见印章共计38枚和1枚收藏标记。其中35枚印章的印文可以辨认识读，另有3枚印章的印文目前尚无法完全辨认。详情参见下文。现将已识读印章及收藏标记分述如下。

(1)



沈守谟印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阴刻，4字双行。这枚印信在“法兰西本”中，共计出现6次。这显然是一枚私人的人名印信。只要弄清沈守谟其人的生平，传抄者的身份和传抄时间也就清晰了。其中一处是与“启先”印、“墨花研雨”印共同出现在同一幅绘画中，“沈守谟印”、“启先”印位于文末落款处“墨花研雨”印位于行文首行顶端。另一处与“韦村氏”印、“忍之”印共同出现在同一幅绘画中，“沈守谟印”、“韦村氏”印位于文末落款处“忍之”印位于行文首行顶端，“IHECPANICS”印也出现在该页。再一处是与“启先”印、“贻口笑”印共同出现在同一幅绘画中，“沈守谟印”、“启先”印位于文末落款处“贻口笑”印位于行文首行顶端，“IHECPANICS”印也出现在该页。再一处，与“韦村氏”印、“墨花研雨”印共同出现在同一幅绘画中，“沈守谟印”、“韦村氏”印位于文末落款处“墨花研雨”印位于行文首行顶端，“IHECPANICS”印也出现在该页。再一处，与“诗卷长留天地间”印、“千里晤言”印共同出现在同一幅绘画中，“沈守谟印”、“诗卷长留天地间”印位于文末落款处“千里晤言”印位于行文首行顶端。

(2)



守谟该组印信为方形，分开成印。“守”字为篆文阴刻，“谟”字为篆文阳刻。此组印信在“法兰西本”中，共计出现1次。该组印信与“深心迁豪素”印和待释第2号印共同出现在同一幅绘画中。“守”“谟”组印与“深心迁豪素”印位于文末落款处，待释第2号印位于文章首行顶端。这套组印显然也是沈守谟的私人印信。

(3)



赵尊该枚印信为方形，篆文阴刻，2字上下排列。这枚印信在“法兰西本”中，共计出现5次。这枚印也是一枚私人的人名印章，持有人的全名留待下文说明。一处和“发堂”印共同出现在同一幅绘画中，二印都位于文末落款处。“发堂”应当是赵尊家族的祠堂印号，而该堂号是李氏家族。可知这位赵尊的全名应当是李赵尊，并在下一枚印章中得以印证。再一处仅有“赵尊”印单独出现且位于文末落款处“IHECPANICS”印也出现在该幅绘画中。再一处与“从其所好”印共同出现在同一幅绘画中的文末落款处“IHECPANICS”印也出现在该幅绘画中。再一处与“鹅费羲之墨”印、“从其所好”印共同出现在同一幅绘画中，其中“赵尊”印、“鹅费羲之墨”印位于文末落款处“从其所好”印位于行文首行顶端。最后一处与“数点梅花天地心”印共同出现在同一幅绘画中，且位置均位于文末落款处，该幅画本中还有“IHECPANICS”印出现。

(4)



李赵尊印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阴刻，4字双行。该枚印信在“法兰西本”中，共计出现2次。这枚印信显然是一枚私人的人名印信。据此可知，上述两印中的“赵尊”仅是李赵尊的名而已。一处与“求仁堂记”印共同出现在同一幅绘画中，且位于文末落款处。再一处与“榭庵”印共同出现在同一幅绘画中，且位于文末落款处。根据其出现位置可知，“榭庵”二字应当是李赵尊的字或号，

“求仁堂”很可能是李赵尊从事书画业务办公处的堂号。这枚印信的出现，标志着李赵尊应当是一位职业的书画大师。



沈业新印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阴刻，4字双行。这枚印信在“法兰西本”中，共计出现4次。一处与“上丘益”印、待释第3号印共同出现在同一幅绘画中，其中“沈业新印”与“上丘益”印位于文末落款处，待释第3号印位于行文首行顶端，该幅图中还有“IHECPANICS”印出现。再一处与“敬菴”印、“名山风雨”印共同出现在同一幅绘画中，其中“沈业新印”、“敬菴”印位于文末落款处“名山风雨”印位于行文首行顶端，“IHECPANICS”印也出现在该幅绘画中。再一处和“味兰”印共同出现在同一幅绘画中，且“沈业新印”位于文末落款处“味兰”印位于行文首行顶端，“IHECPANICS”印也出现在该幅绘画中。



韦村氏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阴刻，3字双行。这枚印信在“法兰西本”中，共计出现3次。一处和“沈守谟印”、“忍之”印共同出现在同一幅绘画中，且“韦村氏”印、“沈守谟印”位于文末落款处“忍之”印位于行文首行顶端，“IHECPANICS”印也出现在该幅绘画中。另一处上文已有说明，在此不再赘述。再一处和“花阴满庭”印、“胎口笑”印、“月色横空”印共同出现在同一幅绘画中，且“韦村氏”印、“阴满庭”印、“月色横空”印位于文末落款处“胎口笑”印位于行文首行顶端，“IHECPANICS”印也出现在该幅绘画中。由此看来，这枚印信应当是沈氏家族的家族名号印信。



从其所好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阴刻，4字双行。这枚印信在“法兰西本”中，共计出现2次。出现背景已见于上文。这应当是一枚鉴赏评议用的艺术印信。



胎口笑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阴刻，3字。“胎”字单行，“口笑”并列右行。这枚印信在“法兰西本”中，共计出现2次。出现背景已见于上文。这是一枚鉴赏印信，持有人为沈守谟。



啓先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阳刻，2字并列。这枚印信在“法兰西本”中，共计出现3次。出现背景已见于上文。这枚印信应当是沈守谟的表字或者别号用印。



墨華研雨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阴刻，4字双行。这枚印信在“法兰西本”中，共计出现3次。出现背景已见于上文。这也是一枚艺术鉴赏印。

(11)



深心託豪素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阳刻，5字三行。这枚印信在“法兰西本”中，共计出现2次。出现背景已见于上文。这枚印信应当是沈守谟的艺术鉴赏印。

(12)



秋水该印信为圆形，篆文阳刻，2字并列。这枚印信在“法兰西本”中，共计出现1次。该印与“无事神仙”印、“知白守黑”印共同出现在同一幅绘画中，“秋水”印、“知白守黑”印位于文末落款处“无事神仙”印位于行文首行顶端，“IHECPANICS”印也出现在该幅绘画中。这枚印信应当是书画作者的别号或者表字用印。但作者不愿意在绘画中明白表达自己的身份，因而故意用别号印信替代自己的真实姓名，考李端棻晚年处境，怀疑此印信的持有者可能是李端棻。

(13)



知白守黑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阴刻，4字双行。这枚印信在“法兰西本”中，共计出现1次。出现背景已见于上文。这枚印章应当是一枚鉴赏印章。印文出自《老子》一书，含义是自己对是非黑白虽然了然于胸，但表现于外却安于暗昧，韬晦自处。这枚印信的涵义与李端棻的晚年处境也可以相互佐证，这枚印信也可能是李端棻的私人鉴赏印信。

(14)



高歌夜半雪压庐该印信为圆形，篆文阳刻，7字四行。这枚印信在“法兰西本”中，共计出现1次。该印与“杏花春雨江南”印、“数点梅花天地心”印共同出现在同一幅绘画中。“杏花春雨江南”印、“数点梅花天地心”印位于文末落款处“高歌夜半雪压庐”印位于行文首行顶端。这应当是一枚艺术鉴赏印。印文出自南宋诗人翁森《四时读书乐》“坐对韦编灯动壁，高歌夜半雪压庐。”又该印与“数点梅花天地心”印连用，因而这枚印信也很可能是李端棻的鉴赏印信。

(15)



杏華春雨江南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阴刻，6字三行。这枚印信在“法兰西本”中，共计出现1次。出现背景已见于上文。该印文是宋代词人虞集的《风入松·寄柯敬仲》词中的词句。据此看来，这枚印信也应当是李端棻的鉴赏印信。

(16)



華陰滿庭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阳刻，4字双行。这枚印信在“法兰西本”中，共计出现1次。出现背景已见于上文。

(17)



聽其自然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阳刻，4字双行。这枚印信在“法兰西本”中，共计出现1次。该印与“无事神仙”印、“有容君子”印共同出现在同一幅绘画中。“无事神仙”印、“所其自然”印位于文末落款处“有容君子”印位于行文首行顶端。该印显然是一枚艺术鉴赏印。

(18) 

敬菴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阳刻，2字并列。这枚印信在“法兰西本”中，共计出现2次。这枚印信在“法兰西本”中都与“沈业新”印并存。据此可知，印文内容应当是沈业新的表字或者别号。

(19) 

榭庵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阳刻，2字并列。这枚印信在“法兰西本”中，共计出现1次。该印与“李赵尊”印共同出现在同一幅绘画中，且位于文末落款处。故知“榭庵”二字应当为李赵尊的表字或者别号。

(20) 

味蘭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阳刻，2字并列。这枚印信在“法兰西本”中，共计出现1次。该印信出现背景已见于上文。这显然是一枚鉴赏印章，印信的持有人就是沈业新。

(21) 

千里晤言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阳刻，4字两行。这枚印信在“法兰西本”中，共计出现1次。该印信出现背景已见于上文。从该印的印文出现背景看，该印信为沈守谟的鉴赏用印。而印文内容可能与绘画“对象”和“内容”远隔千里有关联。意在表明，通过绘画可以传达千里之外的信息，也可以理解为与千里之外的知己相沟通。

(22) 

忍之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阴刻，2字并列。这枚印信在“法兰西本”中，共计出现1次。该印信出现背景已见于上文。由于该印与“韦村氏”印相配合使用，可知此印也是沈守谟的私人印鉴。“忍之”二字的用意在于自勉。

(23) 

求仁堂記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阳刻，4字两行。这枚印信在“法兰西本”中，共计出现1次。该印信出现背景与来历已见于上文。

(24) 

詩卷長留天地間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阴刻，7字两行。这枚印信在“法兰西本”中，共计出现1次。该印信出现背景已见于上文。该印文内容出自杜甫〈链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一诗。这足以表明，该印的持有人沈守谟是一位杜诗的酷爱者。

(25)  齋

發堂该印信为椭圆形，篆文阳刻，3字上下分布。这枚印信在“法兰西本”中，共

计出现 1 次。该印信出现背景与印文来历已见于上文。



月色横空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阳刻，4 字两行。这枚印信在“法兰西本”中，共计出现 1 次。该印信出现背景已见于上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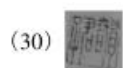
數點梅華天地心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阳刻，7 字两行。这枚印信在“法兰西本”中，共计出现 1 次。该印信的出现背景已见上述。该印文的含义值得推敲，印文与前面提到的“高歌夜半雪压庐”均出自宋元之际诗人翁森《四季读书乐》：“木落水尽千岩（有的版本为“崖”）枯，迥然吾亦见真吾。坐对韦编灯动壁，高歌夜半雪压庐。地炉茶鼎烹活火，四壁图书中有我。读书之乐何处寻？数点梅花天地心。”两方印章同一出处，说明这两方印章可能是同一位持有人。如果这个推论成立，则这两方印章向我们昭示了三点，第一，印章持有人酷爱读书；第二，印章持有人或有过不幸遭遇，如“雪压庐”即可佐证；第三，印章持有人的生活态度积极向上，即使遭逢了“雪压庐”，仍然“夜半高歌”，而“数点梅花天地心”则有“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的哲理，也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的坚韧。故推测这枚印信的持有人很可能就是李端棻。理由与依据详见下文。



師程之印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阴刻，4 字双行。这枚印信在“法兰西本”中，共计出现 1 次。出现背景已见于上文。



無事神仙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阴刻，4 字双行。该印信在“法兰西本”中，共计出现 2 次。出现背景已见上文。印文出处是北宋诗人周邦彦的《鹤冲天·溧水长寿乡作》一词：“梅雨霁，暑风和，高柳乱蝉多。小园台榭远池波，鱼戏动新荷。薄纱厨，轻羽扇，枕冷簟凉深院。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此词写一个不事作为，悠闲自在的小县令的形象。而李端棻怀才不遇，戊戌改变后，被充军新疆，后虽赦归，但闲置于贵州经世学堂，想作为而不可得，故以“无事小神仙”自嘲自慰。这种推测亦不可谓无理。



有容君子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阳刻，4 字双行。该印信在“法兰西本”中，共计出现 2 次。出现背景已见上文。



名山風雨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阴刻，4 字双行。该印信在“法兰西本”中，共计出现 2 次。出现背景已见于上文。印文出自谭嗣同在光绪九年（1883 年）以后，在兰州读书时所写《夜成》

一诗：月霜林微有阴，灯寒欲雪夜钟深。此时危坐管宁榻，抱膝乃为梁父吟。斗酒纵横天下事，名
山风雨百年心。摊书兀兀了无睡，起听五更孤角沉“名山”一词出自司马迁《报任安书》“藏诸名山，
传之其人”一语，“名山风雨”意指重大的学术成果不为当时所理解，反而遭逢了不公的待遇，因而
只能藏之于名山，等待后来君子发掘重用，才能了却“百年”的心意。这枚印章出现在该画本中足以
证明该画本的成书与戊戌变法的代表人物，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联性。该抄本的主持人不仅是谭嗣同
的密友，而且对谭嗣同充满同情和敬意。符合这一身份的人，而且又能够活到戊戌变法后，再次被清
廷所任用，这样的人物非李端棻莫属。



上丘益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阳刻，3字双行。该印信在“法兰西本”中，共计出现1次。出现背景已见于上文。



紹濂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阳刻，2字并列。该印信在“法兰西本”中，共计出现1次。出现背景已见于上文。



鵝費羲之墨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阴刻，5字双行。该印信在“法兰西本”中，共计出现1次。出现背景已见于上文。该印文的出处是唐代诗人杜甫《摇落》中的诗句：‘摇落巫山暮，寒江东北流。烟尘多战鼓，风浪少行舟。鵝费羲之墨，貂馀季子裘。长怀报明主，卧病复高秋。’原诗传达出报国无门之苦痛，这样的心境也与清末名臣李端棻的生平遭遇相合拍，因而这方印章也可能与李端棻有密切关系。



IHECPANICS 该标记为椭圆形，法文阳刻。印文为“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 Paris”的简称，其涵义是“法兰西学院高等汉学研究所·巴黎”。该研究所创立于1926年，最初属于巴黎大学，现任所长为伊夫·埃尔武埃（中文名为吴德明）。这枚印章当是入馆时所用标记。

表4 “法兰西本”已识读印信使用概况

编号	印信内容	出现条目	出现次数	出现页码
1	沈守谟印	伶家苗、九名九姓苗、黑山苗、高坡苗、洪州苗、黑脚苗	6	P. 328、P. 375、P. 420、P. 437、P. 526、P. 564、
2	守、谟	白龙家	1	P. 482
3	赵尊	水家苗、白额子、洞崽苗、葫芦庙、车寨苗	5	P. 345、P. 459、P. 493、P. 520、P. 547
4	李赵尊	八寨黑苗、黑生苗	2	P. 400、P. 431
5	沈业新印	洞苗、清江苗、里民子、鸦雀苗	4	P. 309、P. 405、P. 467、P. 511
6	韦村氏	九名九姓苗、高坡苗、郎慈苗、	3	P. 375、P. 437、P. 595
7	从其所好	土佬佬、葫芦庙	2	P. 493、P. 520
8	赔口笑	黑山苗、郎慈苗	2	P. 420、P. 595
9	启先	伶家苗、黑山苗、黑脚苗	3	P. 328、P. 420、P. 564
10	墨花研雨	伶家苗、高坡苗、黑脚苗	3	P. 329、P. 437、P. 564
11	深心托豪素	白仲家、黑脚苗	2	P. 483、P. 564
12	秋水	谷苗苗	1	P. 285
13	知白守黑	谷苗苗	1	P. 285
14	高歌夜半雪压庐	箐苗	1	P. 317
15	杏花村雨江南	箐苗	1	P. 317

16	花阴满庭	郎慈苗	1	P. 595
17	听其自然	白儿子	1	P. 475
18	敬菴	清江苗、里民子	2	P. 405、P. 467
19	堪庵	黑生苗	1	P. 431
20	味兰	鸦雀苗	1	P. 511
21	千里晤言	洪州苗	1	P. 527
22	忍之	九名九姓苗	1	P. 375
23	求仁堂记	八寨黑苗	1	P. 400
24	诗卷长留天地间	洪州苗	1	P. 526
25	肇发堂	水家苗	1	P. 345
26	月色横空	郎慈苗	1	P. 595
27	数点梅花天地心	车寨苗	1	P. 547
28	师程之印	箐苗	1	P. 317
29	无事神仙	大头龙家、白儿子	2	P. 12、P. 475
30	有容君子	大头龙家、白儿子	2	P. 12、P. 475
31	名山风雨	清江苗、里民子	2	P. 405、P. 467
32	上丘益	洞苗	1	P. 309
33	绍濂	箐苗	1	P. 317
34	鹅费羲之墨	葫芦庙	1	P. 521

通过此表所反映的印信使用规律，不难看出“法兰西本”的所有的传抄临摹人可能仅有4人，他们都应当是职业的书画家，因而他们有可能都是受雇作画，他们的办公处可能就是上文印信中提到的“求仁堂记”的“求仁堂”。参与绘画的四人分别是沈守谟、沈业新、李赵尊三人以及组织传抄者。组织传抄者很可能是清末名臣李端棻。

（四）早大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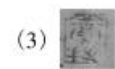
经过仔细查找，传世的“早大本”中，共计使用过印信 9 枚和 1 枚收藏标记。这些印信所出现频率详见下表，以下对这 9 枚印信中印文可识读的 8 枚印信依次陈述。另外 1 枚难以识读者留待下文说解。



蘇气该印信为圆形，篆文阴刻，2 字并列。这枚印信在“早大本”中，共计出现 58 次。与下文“致祥”印形成一套组印。这一套组印共同表达“齡气致祥”这一内涵。这应当是一组书画家的艺名印信，主要用于书画作品的落款。因而在“早大本”的出现位置均位于行文落款处。又鉴于这组署名印信与“黄森”印曾出现在同一幅绘画中，而“黄森”印分明是私人印信。据此可知，这组印信应当是黄森的艺名印信。用印详情参见下文。



致祥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阳刻，2 字并列。这枚印信在“早大本”中，共计出现 56 次。出现背景已见于上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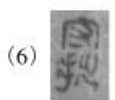
養拙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阳刻，2 字上下结构。这枚印信在“早大本”中，共计出现 3 次。这是一枚持有者用以自勉的鉴赏印。出现背景已见于上文。



一轮明月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阴刻，4 字两行。这枚印信在“早大本”中，共计出现 24 次。由于该印与下文“映冰壶”印出现频率相近且位置都位于文末落款处，故这一组印信印文的涵义是“一轮明月映冰壶”。赵朴初在李叔同百年诞辰之际曾写下“无数奇珍供世眼，一轮明月耀天心”的诗句。故“一轮明月”或源于世人对李叔同的评价，亦或源于李叔同对他自己的评价。因而这组印应当是李叔同私人的鉴赏印。至于“一轮明月映冰壶”这一印文的出处，如下内容可供参考：这组印信当是互文，“一轮明月”省“映冰壶”，“映冰壶”省“一轮明月”，连读则得其义。《五灯会元》有“一轮明月印心池”，1598 年末朝鲜许筠为拜别好友明朝参军吴江人吴明济（字子鱼）所作诗有“肝胆每相照，冰壶映寒月”，宋释智圆有诗“月映冰壶浅，秋澄古鉴圆”。由此看来李叔同出家为僧成为弘一法师后对上述诗句颇能心会，故以“一轮明月映冰壶”自律自勉亦兼自白。而赵朴初赞许李叔同的诗句则是以这组印章的印文为依据的。总之，这组印信极有可能是李叔同的私人印信。



映冰壶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阳刻，三字两行。这枚印信在“早大本”中，共计出现 23 次。出现背景已见上文。



守拙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阳刻，2 字上下结构。这枚印信在“早大本”中，共计出现 30

次。这是一枚鉴赏用印。而且与“养拙”印上下呼应。



黄森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阳刻，2字上下结构。这枚印信在“早大本”中，共计出现16次。这是一枚私人印章。出现背景已见于上文。据此看来，这位黄森显然是这一抄本的主要执笔人。



空山不见人该印信为椭圆形，篆文阴刻，5字并列。该印信在“早大本”中，共计出现3次。该印信与“龄气”“致祥”组印有2次共同出现在同一幅画中，该印信位于行文首行顶端“献气”“致祥”组印位于文末落款处。由此看来“献气”“致祥”组印也可能是书画家的艺名组印，而未识读的一枚印信可能是李叔同和这枚不知名书画家的鉴赏印信。按“空山不见人”出自唐代诗人王维的诗句。王维是虔诚佛教徒，后世的佛门弟子自然乐于引其诗句入印。“早大本”的传抄人既然与佛教信仰有缘，启用这样的印章也是一件自然之事。



昭和二十年七月九日，早大文学部收藏该标记为方形，楷书，16字并列。该标记在“早大本”中，共计出现2次。这是一枚收藏标记。出现于该画本封面与内封之中。这显然是早稻田大学的收藏标记。

表5 “早大本”已识读印信使用概况

编码	印信内容	出现条目	次数	出现页码
1	酥气	黑獐罗苗、白獐罗、宋家苗、蔡家苗、卡尤仲家、普瀛种家、青种家、曾竹龍家、狗耳龍家、马蹬龍家、大头龍家、花苗、红苗、白苗、青苗、东苗、天苗、剪发猓猪、花猓猪、锅圈猓猪、猓猪苗、樊人、土人、杨保苗、八番苗、黑脚苗、黑楼苗、短裙苗、尖顶苗、郎慈苗、罗汉苗、谷蔺苗、阳洞罗汉苗、箐苗、狗家苗、矜家苗、洞家苗、水家苗、白额子、九名九姓苗、爷头苗、洞崽苗、八寨黑苗、楼居黑苗、黑山苗、黑生苗、平伐苗、黑种家、清江种家、白儿子、白种家、土猓猪、鸦雀苗、葫芦苗、洪州苗、西溪苗、车寨苗、生苗	58	P. 1, P. 3, P. 4, P. 5, P. 6, P. 7, P. 8, P. 9, P. 10, P. 11, P. 12, P. 13, P. 14, P. 15, P. 16, P. 18, P. 20, P. 23, P. 26, P. 28, P. 30, P. 32, P. 34, P. 37, P. 40, P. 41, P. 42, P. 43, P. 44, P. 45, P. 46, P. 47, P. 48, P. 50, P. 51, P. 52, P. 53, P. 54, P. 56, P. 58, P. 59, P. 60, P. 61, P. 63, P. 64, P. 65, P. 67, P. 68, P. 69, P. 71, P. 73, P. 74, P. 75, P. 76, P. 77, P. 78, P. 79, P. 80
2	致样	黑獐罗苗、白獐罗、宋家苗、蔡家苗、卡尤仲家、普瀛种家、青种家、曾竹龍家、狗耳龍家、马蹬龍家、大头龍家、花苗、红苗、青苗、东苗、天苗、剪发猓猪、花猓猪、锅圈猓猪、猓猪苗、土人、杨保苗、八番苗、黑脚苗、黑楼苗、短裙苗、尖顶苗、郎慈苗、罗汉苗、谷蔺苗、阳洞罗汉苗、箐苗、狗家苗、矜家苗、洞家苗、水家苗、白额子、九名九姓苗、爷头苗、洞崽苗、八寨黑苗、楼居黑苗、黑山苗、黑生苗、平伐苗、黑种家、清江种家、白儿子、白种家、土猓猪、鸦雀苗、葫芦苗、洪州苗、西溪苗、车寨苗、生苗	56	P. 1, P. 3, P. 4, P. 5, P. 6, P. 7, P. 8, P. 9, P. 10, P. 11, P. 12, P. 13, P. 14, P. 16, P. 18, P. 20, P. 23, P. 26, P. 28, P. 30, P. 34, P. 37, P. 40, P. 41, P. 42, P. 43, P. 44, P. 45, P. 46, P. 47, P. 48, P. 50, P. 51, P. 52, P. 53, P. 54, P. 56, P. 58, P. 59, P. 60, P. 61, P. 63, P. 64, P. 65, P. 67, P. 68, P. 69, P. 71, P. 73, P. 74, P. 75, P. 76, P. 77, P. 78, P. 79, P. 80
3	养拙	黑獐罗苗、六额子、清江种家	3	P. 1, P. 55, P. 69
4	一轮明月	女官、白苗、黑苗、西苗、依苗、打牙猓猪、猪屎猓猪、红猓猪、红猓猪、水猓猪、披袍猓猪、猓猪苗、蛮人、猛人、峒人、佯僮苗、九股苗、克孟牯羊苗、六额子、冉家蛮、清江黑苗、高坡苗、里民子、白龍家	24	P. 2, P. 15, P. 17, P. 19, P. 21, P. 22, P. 24, P. 25, P. 27, P. 29, P. 31, P. 33, P. 35, P. 36, P. 38, P. 39, P. 49, P. 53, P. 55, P. 57, P. 62, P. 66, P. 70, P. 72
5	映冰壶	女官、白苗、黑苗、西苗、依苗、打牙猓猪、猪屎猓猪、红猓猪、红猓猪、水猓猪、披袍猓猪、猓猪苗、蛮人、猛人、峒人、佯僮苗、九股苗、克孟牯羊苗、六额子、冉家蛮、清江黑苗、高坡苗、里民子、白龍家	23	P. 2, P. 15, P. 17, P. 19, P. 21, P. 22, P. 24, P. 25, P. 27, P. 29, P. 31, P. 33, P. 35, P. 36, P. 38, P. 39, P. 49, P. 55, P. 57, P. 62, P. 66, P. 70, P. 72

6	守拙	女官、蔡家苗、卡尤仲家、青种家、曾竹龍家、狗耳龍家、马蹬龍家、大头龍家、红苗、青苗、东苗、天苗、剪发猓猪、锅圈猓猪、黑楼苗、尖顶苗、郎慈苗、罗汉苗、冉家蛮、八寨黑苗、楼居黑苗、黑山苗、黑生苗、高坡苗、鸦雀苗、葫芦苗、洪州苗、西溪苗、车寨苗、生苗	30	P. 2, P. 5, P. 6, P. 8, P. 9, P. 10, P. 11, P. 12, P. 14, P. 16, P. 18, P. 20, P. 23, P. 28, P. 42, P. 44, P. 45, P. 46, P. 57, P. 61, P. 63, P. 64, P. 65, P. 66, P. 75, P. 76, P. 77, P. 78, P. 79, P. 80
7	黄森	白獐罗、宋家苗、普瀛种家、花苗、花猓猪、短裙苗、谷蔺苗、克孟牯羊苗、洞家苗、水家苗、白额子、九名九姓苗、爷头苗、平伐苗、里民子、白龍家	16	P. 3, P. 4, P. 7, P. 13, P. 26, P. 43, P. 47, P. 49, P. 51, P. 54, P. 56, P. 58, P. 59, P. 67, P. 70, P. 72,
8	空山不见人	清江黑苗、黑种家、白种家	3	P. 62, P. 68, P. 73

总览全表后发现，整个画册很可能主要出自黄森一人的手笔，李叔同可能也参与了该本画册的绘

画和书写。对比上文的叙述，黄森显然是应他人的招募而传抄该书。至于“一轮明月”“映冰壶”这一组印信则是鉴赏人的专用印信。这位鉴赏人可能就是中国现代音乐绘画的开创人李叔同，也就是世人所熟知的弘一法师。他是西泠印社的发起人和组织人之一，因而这本绘画的传抄人黄森应当是西泠印社的职业书画家。整个画册很可能是李叔同组织编绘并收藏，其后才转赠给日本友人，最后才辗转为早稻田大学收藏。其它考订详见下文。

（五）国会本

经过仔细查找，传世的“国会本”中，共计使用过印信 2 枚。收藏标记 1 枚。这些印信和标记所出现频率详见下表，以下仅对这两枚印信和标记加以识读。



福恒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阴刻，2 字并列。这枚印信在“国会本”中，共计出现 2 次。这枚印信与下文“舫亭”印往往共同出现在同一位置，“福恒”印在上“舫亭”印在下。一处出现在该抄本序言的行文落款处，一处出现在该抄本的最后一页（41 页）。‘福恒’印显然是一枚私人的人名印章，其中的“福”字出自满文富察氏的汉文翻译缩写，“恒”字则是他的人名。



舫亭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阳刻，2 字并列。这枚印信在“国会本”中，共计出现 2 次。该印出现背景已见于上文。该印印文应当是“福恒”的表字或者别号，它也是一枚私人印章。



ORIENTALIACHINESE 该标记为方形，英文阳刻，英文文字两行，收藏编号两行，涵义是指“远东中国”。编号为“D827M59”。该标记在“国会本”中，共计出现 2 次，且都位于该抄本封面和内封。经查美国国会图书馆建馆于 1800 年，而这本《百苗图》抄本入藏时间则迟至 20 世纪 30 年代。详情参见下文。注意上述两枚私人印章的持有人为清末人，而“序言”则声称该书编成于乾隆丙午年（H86 年），时间与人物相距 100 多年，足证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本纯属伪作，是清末民初西泠印社的职业画师所作的赝品，目的可能是为了骗取收购者和美国国会图书馆的高额报酬。

表 6 “国会本”已识读印信使用概况

印信内容	出现条目	出现次数	出现页码
福恒	谷兰苗、六洞夷人	2	P. 1、P. 41
舫亭	谷兰苗、六洞夷人	2	P. 1、P. 41

三、印信持有人身份考

加有书画者个人印信的《百苗图》抄本，如上文所言，共计 5 本。其中，“台乙本”和“国会本”纯属赝品。单就印信而言，这两个抄本所用印信已属伪造，可以提供其作伪的证据。“博甲本”“

法兰西本”和“早大本”所见的私人印信，其价值与作用却与之相反，可以为我们提供相关传抄人姓名、传抄人身份、传抄时间、传抄地点和传抄意图的可贵历史资料，可以使这三个真实抄本的历史价值得到极大的提升。

“国会本”除了收藏印信外，仅出现 2 枚私人印章。其一的印文为“福恒”，其二的印文为“舫亭”。由于两印在该画册中成组连用，不难推知，“福恒”乃是私人的姓名印章，“舫亭”乃是福恒的表字或别号。查阅相关资料得知，福恒为清末人，因攀附慈禧太后贴身太监李莲英而名噪一时，并成为李莲英的义子。李莲英落马后，因受牵连被抄没家产。然而在“国会本”序言中却将年款书写为“乾隆丙午年（H86 年）9 月中晚”，这一年款说明比福恒的生活期间，整整提早了 120 多年。足以证明不仅该序言作伪，而且整个画本内容都不可能出自乾隆朝，而是迟至民国初年才抄成的赝本。

清代还有一位名臣“傅恒”引起了我们的关注。人名用字虽有区别，但汉字读音却与“福恒”十分接近。《清史稿·傅恒传》记载，此人出身于满洲老姓富察氏。满洲老姓富察氏为清代皇室八大姓之一。此人生前为乾隆皇帝近臣，南征北战数十年，功勋卓著，授封为亲王，名扬中夕卜，晚年曾任云贵总兵官，统帅大军与缅甸作战，对贵州世居民族情况有较深入的了解。附会他为该书作序，很容易迷惑外籍文物收购商，从中谋取暴利。阴谋容易得逞的深层原因在于，满文老姓翻译成汉文时，通常都需要缩写，富察氏既可翻译成“傅氏”，也可翻译成“福氏”。外国人购买文物时只听读音相近，不知其中隐含着翻译中的曲折，因而信以为真。

傅恒在征缅甸之战中身染重病，回师后不久便去世，去世时间为 1770 年。而该本画册所书写的作序年款时间则为“乾隆丙午年（H86 年）”。到这时真傅恒已经去世了 16 年，哪儿还能为该书写序呢？这更是该书作伪的明证。此外，该序言中还提及另一个人名“楚”。这位楚先生为谁？此前未引起学者注意。查阅清代典籍及相关资料得知，清代的宫廷画师中确有一人很可能使用过这个名字，他就是闻名中外的意大利画师郎世宁。郎世宁原名为“朱塞佩·加斯·底里奥内”。人名中的“朱塞佩”汉语音译时的缩写就可以写作“楚”。可是郎世宁在傅恒之前 2 年已经去世，而该书序言却说他奉乾隆皇帝旨意，亲自到贵州省视察并画成该本图志。必须注意的是，郎世宁当时即使健在，也已是 70 多岁的老翁。乾隆皇帝不可能在这样的情况下，还命令他到贵州省视察。而到“乾隆丙午年”时，郎世宁已经去世 19 年，根本不可能是这本画册的作者。如果楚先生就是郎世宁的推论成立，则该书序言的内容亦可成为该书作伪的证明。

“国会本”的成书，从策划开始就抱定了作伪谋利的动机。对比“国会本”和“法兰西本”的绘图后，发现“法兰西本”正好是“国会本”的作伪蓝本“法兰西本”成书于清末江南画派的职业书画家。据此推知，“国会本”也可能出自这批书画大师之手，作伪地点可能就在杭州、苏州一带。作伪的关键手段，是先收购到被抄家后流入到市场的“福恒”“舫亭”二印。利用“福恒”与“傅恒”二人名字同音的特点，而假冒编写了序言，以此抬高该画本的价值。而西方文物收购商不懂汉语，更不懂满语，因而容易上当受骗。收购此书时应该是耗费了巨资，再转卖给美国国会图书馆时也当获得了高额报酬。此书进入国会图书馆收藏时间最早当在民国时期。

总之，通过印信的比对可以提供众多的证据，证明“国会本”纯属有意作假谋利。该画本提供的内容不能代表乾隆朝时期贵州省世居民族的实情。伪抄中的人物名须仔细考订，否则会给学术研究造成严重的干扰，希望引起学界的关注，望勿以讹传讹。

“台乙本”的作伪情况也与此相似。此前，对该画本的作假已有人做过深入探讨，证明这是一个伪本。这里仅对其印信的不可靠做深入探讨，以此提供进一步的作伪证据。“台乙本”所见私人印信，全部集中出现在该书的最后一页。这样的用印方式不符合印信使用规律，这本身就是作伪的铁证。该书所用的印信涉及到三位关键人物——乾隆皇帝、郎世宁、蒋廷锡。蒋廷锡是清康熙时期的朝廷重臣，曾经出任贵州省的高级地方官，对贵州世居民族有所了解，自当不言而喻，但此人于雍正十年卒于任内而该画本中却出现了乾隆皇帝为太上皇时的鉴赏印章（“古稀天子之宝”印），这就令人不可思议了，因为其间的历史间隔前后相差了60多年。印信中的另一位关键人物郎世宁曾经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任职。此人虽然是一位技艺高超的画家，而且可能与蒋廷锡有过接触，但他们是否合作编绘过这本画册则于史无征。再看他们二人的用印方式，全部集中在最后同一画页上，其他画页完全没有印信，这样的情况与真本存在的“博甲本”“法兰西本”“早大本”的用印方式都不同，可以说是完全不懂用印规则。这同样是该画本作伪的铁证。更值得注意的是，该画本中出现了属于乾隆皇帝的印章多达5枚。然而这5枚印章的使用场合和对象，应当各不相同。从印信的印文看，乾隆皇帝使用这些印信的时段也各不相同。但在该画本中这5枚用途完全不同的印章，却共同出现在同一画页上。这同样不符合用印规则，因而也是该画本作伪的铁证。

总之，“台乙本”的作伪人也是清末民初西泠印社的书画高手，作伪的目的也是为了骗取高价，差异仅在于“台乙本”为傅斯年所收购，并带到台湾收藏。时下，台湾学者和国外学者对该抄本肯定有加，不少著名的论述都取材于该画本，以讹传讹，危害颇深，需要引起学界高度关注，望勿一错再错。

“博甲本”所见印信中，“桐城姚氏”收藏印章最为关键。“桐城姚氏”是否就是桐城姚鼐的收藏印章。姚鼐，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1]1>18°2，桐城人，极为知名，门生遍天下。出于对文物收藏和资料收集的需要，组织传抄《百苗图》原本《八十二种苗图并说》不仅是情理之中的事，而且还拥有雄厚的财力足以支撑这一浩瀚工程的完工。至于此项工作，是由姚鼐亲自组织亦或是其后继之人才得以完成则有待进一步考证。该本所见印信中“张廷珩”、“张启仕”二组私人印信最具史料价值，其中张廷珩生平已经查实，据《梅李镇志·梅李卷》P792记载如下：

“张廷珩（生卒不详）字谷珍，号虞樵，清代梅里镇人。父尹宾，字使儒，诸生，高文不遇。张廷珩弱冠中乾隆庚子（1780年）科举人，大挑授镇江府训导。为人沉静，简默，而豪于饮。”张廷珩弱冠时期既然是在“乾隆庚子年（1780年）”中举人，那么他的生活时段哪怕是仅仅活到60岁也要延伸到嘉庆朝的中后期。这就表明，姚鼐（或其子）、张廷珩和《八十二种苗图并说》的作者陈浩生活的时段恰好一致，三人会面的可能性完全存在。

考虑到陈浩本为江阴人，又是在嘉庆朝初期出任贵州八寨里苗同知，那么他致仕后，返还故里时

，完全有可能接触到张廷珏和姚氏父子。姚氏父子和张廷珏一旦获知《八十二种苗图并说》一书后，出资传抄也就势在必然了。事情很清楚，如果他们没有直接接触过陈浩，身处千里之外的姚氏父子和张廷珏都不可能了解贵州省世居民族的文化实情，更不会想到要编绘这本图志。由此推测，当代传世的“博甲本”完全可能是《八十二种苗图并说》的第一个传抄本。所书所绘内容当是出自陈浩口述或亲笔绘制的草稿。因而“博甲本”应当是最接近《八十二种苗图并说》原型的最佳抄本。

诚如《梅李镇志·梅李卷》所言，张廷珏为人沉静，简默，而豪于饮，这也是一个怀才不遇的文人可能有的生活方式。这样的书画家为生活所迫，替姚氏父子传抄《百苗图》换取工钱度日，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这也符合他的社会身份。据此推知，张廷珏作画的用意可能是为了生活。该书中留有的“琴书自荐”印，可以进一步坐实他的这一特有社会身份。书中另一位书画者张启仕，他肯定是张廷珏的本家，而且还可能是张廷珏的长辈。这有该抄本中的“寿松”印可资佐证。鉴于他是和张廷珏合作传抄该书，其社会身份也应当是一位职业的书画家，也是靠出卖书画度日的文人。

该抄本中还有一枚特殊的印信，印文为“專间”。但在全书中没有找到任何带有此人姓氏印文的印信。鉴于“專间”二字的字面涵义与陈浩人名中的“浩”字具有一定的联系，笔者因此怀疑“專间”可能是陈浩的表字用印。至于为何姚氏家族不高价聘请陈浩重画全书，这同样事出有因。理由在于，陈浩虽然编绘了《八十二种苗图并说》全书，但陈浩的绘画技艺和书画功底乃至他的艺术声誉都无法与张廷珏等人相比。姚氏既然要出巨资收藏该书的精品，当然不可能看重陈浩，而只能看重张廷珏等人。不过陈浩在其中肯定获得过不菲的报酬，也提供过草稿，他的画作也可能收入该画册，但却不让他正式署名，则是雇主意愿的情理中事。

总之，通过印信的释读比对，再辅以相关资料的查询，基本可以确认当今传世的“博甲本”为除陈浩所撰《八十二种苗图并说》之外的第一真善传抄本。该本的传抄时间可以确定在嘉庆中偏后期，传抄地点在常熟与镇江之间，抄成后一直由桐城姚氏家族收藏保管，因而该抄本的史料价值极大。时下有人认为《百苗图》并非成书于一时，且并无统一的作者，甚至认为《百苗图》的内容和图可以上溯到乾隆中期的某些著述，但若就“博甲本”所见印信为证，上述两种研究结论显然无法成立。不仅陈浩真有其人，真编过其书，而且传世的“博甲本”确实系《八十二种苗图并说》的第一抄本。传抄人和传抄时间都确凿可靠，传承关系也清晰明了。更值得注意的是，张廷珏等人既然是职业书画家。为了谋生，他们在为姚氏精心传抄该书的同时，肯定留有副本，以便日后仿制变卖他人。这就为后世在江南地区，继续传抄该书留下了蓝本。其后的“刘甲本”“刘乙本”“民院本”应当都是从这样的蓝本改画而来。这也可以为这些抄本的内容和文字如此接近，能够给出一个合理的解答。

“法兰西本”，关于该抄本的收藏来历，法国学者纪可梅曾做过如下介绍：法国保存的这个抄本，是清朝末年朝廷大臣李端棻在贵州省任职期间，赠送给贵州六冲关天主教神学院神父的礼品。其后，该神父返回法国时，将这份厚礼也带回了法国。再由他的侄儿转赠给法兰西汉学高等研究院收藏。她的上述介绍，在“法兰西本”所见印信中，确实可以找到间接的证据。

“法兰西本”中有一枚特殊的印信，印文为“数点梅花天地心”。这枚印信有意回避持有者的真

实姓名，显然事出有因。持有人可能是出于身份的特殊而不便直言。但印信印文却分明曲折地表达出一丝渴望大地回春之意，而这一内容正好与李端棻的生平经历相合拍。李端棻在官场上开始一帆风顺，最高职务曾出任朝廷礼部尚书一职。但其后因为支持康有为、梁启超发起的戊戌变法，于变法失败后受到牵连，故李端棻不仅被罢官，而且还被判刑充军到新疆服役。其后，因为他推动了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的创建，学校恢复时得以赦免。但被谪迁派往贵州省担任学正。这样的经历与该印文的涵义如合符契，“天地心”三字意在表达自己的作为，代表着天地良心，眼下虽然仕途坎坷，但傲寒绽放的梅花一定会迎来天地回春。据此，完全有理由猜测这枚印信的持有人很可能就是李端棻。

该抄本的其他书画人，沈业新、沈守谟、李赵尊的社会身份显然是职业的书画高手，是因为李端棻需要送礼而应募传抄。至于传抄的蓝本则可能出自两个源头。一是李端棻凭借他的身份和名望完全可以借阅贵州省政府珍藏的《八十二种苗图并说》真迹做参考；二是沈业新、沈守谟、李赵尊等人都是江南才俊，他们完全有可能接触过姚氏家族所珍藏的“博甲本”。仔细比对“博甲本”和“法兰西本”的文字和绘图，不难发现文字的内容大体一致，但绘画的内容却有明显的差距。“法兰西本”所绘人物大多在头顶上插有羽毛“博甲本”中这一装饰并不普遍。这一装饰与贵州各世居民族用弩机伏击打猎的生计方式有直接关联，而为江南的文人很难理解，更不会引起他们的注意。因而“法兰西本”出现这样的装饰特点，极有可能是陈浩原本已有的内容。

总之，通过印信比对可以确认，“法兰西本”确系李端棻组织传抄，传抄的书画家大致是从江南文人中招募而来。因而这个抄本虽然抄成的时间迟至二十世纪初，但传抄的内容与《八十二种苗图并说》极为接近。可惜之处仅在于这不是一个全本，而是一个残本。因而其史料价值稍逊于“博甲本”。

“早大本”中的印信，仅留下“黄森”这一枚私人印信。他应该是参与抄录的书画家之一。至于其他的抄录者，从现有印迹出发，大致可以确认是出自西泠印社的书画高手。西泠印社由书画大师吴昌硕所开创，开创时间为1904年。西泠印社的艺术活动不仅汇集了大批的书画高手，而且还吸引了一批日本文人，如：河井仙郎、田中庆太郎、长尾雨山等人。这些日本文人有的是吴昌硕的朋友，有的是吴昌硕的学生，回国后都成了日本的篆刻书画大师。此外，西泠印社最值得注意的是李叔同。他曾留学日本，与日本文人交往甚密。他是西泠印社的代表人物之一，又是中国现代音乐绘画的开创人之一。日本文人来华参与西泠印社的活动时，他既是引荐者，还可能直接充当翻译，很多日本文人都曾经是他的学生。该画本中的“一轮明月”“映冰壶”组印就是李叔同的私人艺术鉴赏印。因而有理由认定李叔同在这本画册的编绘期间发挥过关键作用。不过该抄本的绘成时间，理应迟至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若非如此，长尾雨山等人早就该把这个画本带到日本转卖了，而不会迟至昭和二十年（1945年）即日本投降前夕的一个月才转入早稻田大学收藏。

该抄本的蓝本应当是流传下来的“博甲本”的副本，这从所绘所书内容比对中也可以得到证实。至于该画本传入日本的过程，则可能与侵华日军的高级将领有关。他们收购该画本的目的是为了私人收藏。抗战结束前夕，侵华日军的将领已经获知末日来临，为了避免战后被清算，因而在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前夕，才匆忙将这个画本转运回日本，赠送给早稻田大学收藏，以此规避被清算。以此推测，

这个画本的持有人应当是在这一时段内返回日本的侵华日军高级将领。

四、待释读印文述略

除了以上所讨论过的印文外，还有少数印文由于字迹模糊至今无法准确识读。现将这批印文简述如下，仅供研究者做研究参考。

（一）“博甲本”难以识读印信

经过仔细查找，传世的“博甲本”中，共计使用过印信 23 枚，22 枚已识读，见前述，1 枚难以识读。这枚印信所出现频率详见下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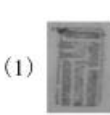
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阴刻。印文内容与字数，有待考证查实。该印信在“博甲本”中，共计出现 4 次。

表 7 “博甲本”难以识读印信使用概况

印章编号	出现条目	出现次数	出现页码
1	青仲家、打牙乞佬、冉家蛮、楼居黑苗	4	P. 48、P. 148、P. 412、P. 434

（二）“法兰西本”难以识读印信

“法兰西”本共有 31 个条目并绘图，其中有 28 条目并绘图有印信出现，所见印章共计 38 枚及 1 枚收藏标记。其中 35 枚印章的印文可以辨认识读，另有 3 枚印章的印文目前尚无法完全辨认。现将难以识读印章分述如下。这些印信所出现频率详见下表。



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阳刻。印文内容与字数，有待考证查实。该印信在“法兰西本”中，共计出现 1 次



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阴刻。印文内容与字数，有待考证查实。这枚印信在“法兰西本”中，共计出现 1 次。



该印信为椭圆形，篆文阴刻，共 3 字两行排列。印文疑为“一 X 志”3 字。该印信在“法兰西本”中，共计出现 1 次。

表 8 “法兰西本”难以识读印信使用概况

编号	出现条目	出现次数	出现页码
1	谷苗苗	1	P. 285
2	白龙家	1	P. 482
3	洞苗	1	P. 309

（三）“早大本”难以识读印信

经过仔细查找，传世的“早大本”中共计使用过印信 9 枚，1 枚收藏标记，其中 8 枚已识读，1 枚难以识读。这枚印信所出现频率详见下表。



该印信为圆形，篆文阳刻。印文内容与字数，有待考证查实。该印信在“早大本”中，共计出现 14 次。这枚印信与“一轮明月”“映冰壶”组印有 9 次共同出现在同一幅绘画中，该印信处于行文开头顶端，“一轮明月”“映冰壶”组印处于文末落款处。这枚印信与“酥气”“致祥”组印有 5 次共同出现在同一幅绘画中，该印信处于行文开头顶端“龄气”“致祥”组印处于文末落款处。

表 9 “早大本”难以识读印信使用概况

编号	出现条目	出现次数	出现页码
1	白苗、黑苗、西苗、打牙乾猪、猪屎乾猪、红乾猪、水乾猪、披袍乾猪、笋苗、矜家苗、洞崽苗、白儿子、土乾猪	14	P. 15、P. 17、P. 19、P. 22、P. 24、P. 25、P. 27、P. 29、P. 50、P. 52、P. 60、P. 71、P. 74、

这批印文同样包含着若干重大的历史信息，很值得深入探讨。但愿学界同仁关注这一研究课题，笔者愿与大家共勉。

五、结论与延伸

基于上述讨论，笔者认为，《百苗图》各抄本的传承谱系理应如下：

陈浩《八十二种苗图并说》博甲本”张廷珏等人刘甲本’、‘刘乙本”等民院本”。陈浩《八十二种苗图并说》+“博甲本法兰西本国会本”

“博甲本”副本早大本”。

当前传世的各抄本中，其史料价值排序应当是“博甲本”为最，“法兰西本”次之；“刘甲本”又次之。

此前的研究者习惯于就《百苗图》某一抄本展开深入研究，其成果固然价值很大，但美中不足在于，较少关注按照时间顺序去加以对比分析，更鲜有人关注书中印信的史料价值，以至于形成的结论

中，确实存在着某些缺陷。因而笔者就《百苗图》各种版本中的印信进行了尝试性研究，并期引起学界同仁对这些印信的关注，以解决诸多久议不决的难题。笔者水平有限，本文仅是浅尝而已，不当之处还望学界同仁斧正。

笔者按：本文写作过程中承蒙杨庭硕教授三度审阅、三次校对，并增补了某些关键内容。敬表谢忱。

参考文献：

- [1]杨庭硕. “百苗图”贵州现存抄本述评[T]. 贵州民族研究, 2001, (4).
- [2]李宗昉. 黔记[M].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6.
- [3]杨庭硕, 潘盛之. 百苗图抄本汇编[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4.
- [4]杜薇. 台湾新版《番苗画册》真伪及价值考辨[J]. 民族研究, 2000, (4).
- [5]清代《宋诗纪事》[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 [6]张炳之, 沈起炜, 刘德重. 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 [7]常熟市梅李镇人民政府编. 梅李镇志·梅李卷[M]. 苏州：古吴轩出版社, 2006.
- [8]胡进. “百苗图”源流考略——以《黑今苗图说》为范本 CT]. 民族研究, 2005, (4).
- [9]严奇岩. 《八十二种苗图并说》的成书年代考证——以余上泗《蛮峒竹枝词》为研究文本 CT]. 民族研究, 2010, (1).